

“价值中立”与文学史书写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方法论探析

徐 敏*

〔摘 要〕 洪子诚以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撰述中国当代文学史,出色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挖掘了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全方位渗透进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同时又对这一思路背后的“解构”意识持保留态度,从而引发学界争议。不同学者因着相异的现实认知与研究动力,而对知识与权力、审美与意识形态诸关系产生彼此抵牾的理解与阐释方向。此一学案为衡估当代文学学界的学术诉求及限度,提供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关键词〕 价值中立;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方法论

“价值中立”语出马克思·韦伯《以学术为志业》。韦伯认为,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具有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的特性,在研究中应自觉选择“价值中立”的立场。所谓“价值中立”,是一种“内在的直接的要求,即调查者和教师应无条件地与经验事实的建立保持距离,并与他本人的实际评价亦即他的对这些事实的圆满或是不圆满的评价保持距离”^①。这一学说,对我国文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即持此学术立场进行当代文学史研究,其成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围绕学术界对这一方法论的争议,探讨在中国文学史研究语境中这一研究立场的学术诉求方向和限度。

一、知识与价值的对立与互通

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因文学史内含文学与历史两个维度,价值中立在具体运作中也呈现这两个维度方向。首先看落实于历史维度的“价值中立”,其实现途径是“回到历史深处”。体现于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中,即对思潮、运动中各代表方的“了解之同情”。洪子诚的论述态度,简言之,可谓“中立”。“中立”如何达至“了解之同情”?不妨取喻一个人的左右手对弈这一情形。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就出现了三个角色:左手、右手,以及那个保持自己中立,因而能代各方立言的“我”。

* 文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211100。本文为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写文学史’研究——以学案为考察中心”(2012SJD750019)中期成果。

①[德]迪尔克·克斯勒:《马克思·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郭峰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32-233页。

“我”之能够代各方立言,乃因“我”能分身为不同角色。所谓分身,是指真正融入这一角色,对其思路、逻辑走向有切身了解。要做到这一点,这时的“我”必然采取有限视角,而不得如潜入对方内阵的间谍一般,窃取其机密,成全另一方的棋路。这就对“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贯彻这一角色要求,在走棋过程中他得不断调整自己的态度,不要让“我”的全能视角占据了代某方立言的有限视角,也不能分身为某方时半心半意,有意无意偏袒另一方。这一角色形式的建立,端赖“我”能否担负这一角色要求。

历史叙述者,就颇似这个“我”,既不代表左方立场,又不偏向右方意志,力求公正无偏。但一位治史者,要能达到对历史中不同派别与角色的“公正无偏”,乃有一知识学前提,即深谙双方(或多方)的处身情境、言行逻辑,犹如熟悉自己的左右手。回到历史深处,就不是一个态度或意向问题,而首先挑战治学者的学术功力:能否对历史事件、材料有全局的掌握,或者说,依靠尽可能丰富的材料去还原那些历史的“空白”与“未定点”,而尽量减少材料、事实之间的抵牾,建构出一副大致符合原貌的历史文化地图^①?有此“史学”基础,历史研究者的“价值中立”才有可能。否则,不免流于空言。其“价值中立”的意识越强,越可能将本就糊涂的历史搅成一本糊涂账。这也就是某些史学功底不深,却奢谈方法与理论视角的学人易入之歧途。

回到历史深处,从表象上当然指研究者从现在回到过去。但从理解的逻辑上说,研究者又要力避以后来者的眼光衡量历史“角色”,力求站在这一角色的历史逻辑起点上,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述。因为历史中人,不能对历史全局有相对完整的判断,他们总是采取有限视角来处身立事,即便其局限有大有小,也只能推测历史的各种可能,总不如后来者看到历史运

演的结果而更能知其所以。这是人情和历史时势使然。研究者设若以今例古,或以今责古,则于人情常理不合,亦缺乏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意识。

简言之,就材料而言,历史研究者对材料掌握当如对自己左右手之了解。这体现了“学”的功底。就角色设定而言,历史评述者应有中立的意识,此中立意识,非“无意识”,而是能够溶身于他者之中的理解与批评意识。能为各方代言,设身处地,不仅为自己的价值同情方,也为自己的价值批判方代言,此乃史家难得之“冷静”。此意识体现在视角上,当采取有限视角,而非后来者的全能视角。此为方法意识,亦可见出史家之“识”。

洪子诚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价值中立”意识,融汇于特殊的叙述方式当中。在论述一个文学现象时,论述者无倾向性的立场,对不同观点的持论立场与前提首先予以承认,即赋予它“发展”自己逻辑的权利,这一观念的内在逻辑在洪子诚的笔下,得到尽可能充分的延展。譬如,论述“当代文学经典的重新确立,无论在方法和尺度上,都留下若干难题”时,洪子诚叙述道:“这些难题,困扰着新秩序的确立者。”^②“困扰”一词,明显有代对方设想的意味,但这样的“设身处地”,显然不是作者本身的道德立场,而是一种学术之“同情”。这一“同情”感,无涉个人道德价值认同。也就是洪子诚自言的“对‘历史’评述的道德问题,转移成不那么‘道德化’的学术问题”^③。

但是,对其前提的重视,尊重各方论点并发展其逻辑内蕴的同时,也带来这样的叙述效果:当那历史逻辑运演的“终端”已为历史的后来者承担或目睹,那么,人们无疑会把审视的目光投向那悲剧的逻辑起点:前提的不正当性甚至荒诞性由此得到揭示。这是看似无动于衷的揭

^①洪子诚在“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即谈到“史料”的重要性: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是以对自身(包括理论、方法和所处理的对象)的反思、批判作为最初的工作的。这一“破坏性”工作是必要的前提。但是,后来却并未因此建立较为完备的研究规范。对史料的忽视,是暴露出来的问题之一。见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4页。

^②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第94页。

^③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第109页。

发,其控诉力量始终压在纸背。因此,作者用“困扰”一词,并非充满巧致而又几近虚无的嘲弄,此一对于体制制定者的“困扰”,会放大成对千百无辜生命的“困扰”乃至“清算”。在这一残酷的历史事实面前,采取任何嘲弄都未免于轻薄。有许多论者都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史》蕴含“刀笔老吏”般的识断,大概即有感于洪子诚的这一叙述风格。事先搁置了的“道德立场”,在此逐渐明朗。是以所谓“价值中立”作为历史研究方法学的意义,却必须置于研究者“精神起点”即人类历史文化的价值关怀之前提下来理解。只有在此精神结构中,“价值中立”才具有方法学的正当性。孤立地强调“价值中立”、“价值悬置”的知识学立场,将严重扭曲洪子诚学术研究的初衷。

洪子诚在“历史”维度中的“价值中立”的运用,引发学界的密切关注与讨论。何以引发讨论,当从两方面得到揭示,一面是文学历史研究之特殊性质,一面是以往的研究状况。文学历史,既是经验的科学,又关联着价值判断。因为这两方面联系密切,所以就有两种可能的研究进路:一,取“应当如何”的价值视角,这是非经验的而倾向主观的。用此视角来探讨文学史的经验走向,始终贯穿着对经验对象的价值判断,亦即事实是在评价中呈现的。因此,这一“事实”已经过观点的浸淫,难保不发生局部膨胀或收缩的情形。其二,分两步走,将经验对象的“事实”与“价值”分开,先陈述事实如何,以客观事实的力量显示“真假善恶”。因而,从经验的事实角度看和从价值的观点看同一段历史,将呈现两种异质视域。而我国以往的文学史写作,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往往先行决定了论述采取的视角以及呈现事实的方式、角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价值视野,被轻易置换为政教权力所支持的“政治正确的文学史观”:它们往往一开始就把“现成结论”端出来强加于人,试图“罢黜百家,定于一尊”;或者“像一条铺设好

的‘高速公路’”,顺着一条道走到黑,被引到顺理成章的结论面前为止^①。学界对此述学方式的反省与警惕,使得以“价值中立”为基点的历史叙述与研究范式更为学术界乐意接受。在这样一个现实动因中,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学术界对洪子诚持价值中立态度的文学史写作投注的讨论热情。值得关注的是,在普遍赞同这一叙述立场的前提下,也出现了一些商榷意见。这一“共识下的歧见”,其实展开了对这一观念的不同理解方向,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学术理路背后的精神背景。我们以李扬、昌切两位学者对洪子诚提出的意见或建议为中心展开讨论。

在李扬与洪子诚的学术通信中,李扬认为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方法论的创新,以价值中立的学术立场突破了以往的历史叙述的“等级制”结构,但问题在于“未能将此观念贯彻到底,在80年代以来的文学处理上,依然有‘等级制’的阴影”。赋予作品以等级序列,意味着作者已然进行了价值判断。而在他看来,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学历史”是作为“知识”进入视域的,与“价值”无关。李扬关心的乃是将“‘真’与‘假’的‘价值’问题转变为‘知识谱系学’的问题,也即一个‘学术问题’”^②。李扬的逻辑里,“价值”隐退,知识与价值形成了一个对立项。这一对立结构,在昌切那里也得以申发,洪子诚带有启蒙意味的人文关怀因而成为受责备的“多余项”:^③“虽然著者谨言慎行,尽量保持中性的学术立场”,但是就其选择而言,著者常常“不自觉地偏离学术立场,认同启蒙性质的概念,游移在学术立场与启蒙立场之间”^③。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围绕“价值中立”,李扬、昌切与洪子诚的争端所在:在李扬、昌切等学者的视野里,历史研究是作为知识探究的纯客观面目出现的,其中不涉道德与人文关怀,后一价值取向只会侵害前一学术立场的纯粹性。但在洪子诚那里,“价值中立”的方法论意义,则

①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7页。

②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第176页。

③昌切:《学术立场还是启蒙立场》,《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需要放在一个完整的“研究结构”中来定位:“因而在人文学科,价值、信仰问题不仅是前提,而且是贯穿其中的。我根本不能认同知识和信仰、价值可以绝对分离的说法。基于这一认识,我就不大能理解‘启蒙’和‘学术’设置为对立项。”(引自洪先生与笔者的学术通信)

如果回到马克思·韦伯的语境中,要理解其价值中立,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不可忽略,即“价值关联”:^①“他认为社会学在内的人文科学,其任务是研究真实的存在,研究‘意义’和‘意向’的运作,所以我们不可能客观地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可能的只是一种‘价值-观念意义’的研究选择,所以‘认识论的兴趣’和‘价值观念’也就组成了科学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所谓的‘价值关联’。”^②洪子诚的行文未见直接引述韦伯“价值关联”的说法,但可以清楚看到他对价值关联的自觉意识。将价值中立和价值关联有机融合,文学史研究即可定性为一种“非纯价值判断”。因其有事实经验,对这一经验事实的研究,不应过早渗入研究者的价值倾向;但是作为人文学科,文学史无论在文学还是历史维度,都存在一个主体与之的价值关联问题。对于历史和文学现状也就是实践的内在关怀应是研究的起点,并贯穿其始终。价值中立不意味着价值冷漠,只是不让价值判断首先绑架了事实本身。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择此题目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即表明了此议题与研究者和社

会具有密切的价值关联。这一价值关联,以基本的信仰、关怀赋予这一历史认识或还原工作以方向。无此关怀,则历史事实的陈列将出现矛盾的无序状态,最终被历史虚无主义情绪淹没。因而,“非纯价值判断”一方面反对“纯价值判断”,强调其认识论的兴趣;一方面警惕“非价值判断”,贯穿人文关怀。然而证之于历次基于历史记忆和现实动因而接受西方思想并予以阐释的文论经验,这一接受过程中,最易出现的是对理论内涵的诸多维度进行选择性的单向度扩张,以应对过于强烈的现实焦虑。具体到这一学案,“非纯价值判

断”之性质即在另一单向维度得到了伸张:从纯价值判断走向非价值判断。洪子诚与李扬、昌切等人的分歧关节点即在此。这并非知识结构不同,而根源于精神结构有异,对知识的理解,被“知识”的渗透、占有度也有所不同。针对自己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困惑,以及对学界新潮现象的观察,洪子诚提问:“我们在寻找‘知识’和‘方法’的努力中,终于有可能被学术体制所接纳,这时候,自我更新和反思的要求是否也因此冻结、凝固?”^③在力求学术的表达之时,对“知识”所要求于人的、可能导致人的精神维度萎缩的可能始终保持警惕,形成了洪子诚学术表达中“持续的张力”。

二、审美与意识形态之夹缠

如果说,当代文学史作为“史”,以上“价值中立”之法尚有可以发挥的研究空间,文学史作为“文学”史,这一历史批判方向,具体而言,审美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思路,又将为“文学性”(审美感)提供怎样的讨论空间?

我们先将审美意识形态中的审美和意识形态分别做一探讨。意识形态这一名词的流行要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基本上是把意识形态看做代表阶级利益的“假意识”。所谓“假意识”不但“欺人”而且“自欺”,即自以为所持的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真理或人人都应该接受的道理,而其实则是为自己的阶级或集团利益辩护的说词^④。现代社会对审美的关注,针对的则是人类在文明进程中不断被文明的理念异化而失去其“自主”的堕落状况,存在主义者将这一现象描述为“沉沦”。人之沉沦的可能渠道,便是深陷于各种由他者提供的“听上去很美”的“真理”或“主义”,在心灵和行为层面滑入自动化的套板反应。审美的本质则是通过对人的感性重视与发掘,提醒人们被遗忘的本真存在。它的旨归

^①赵建华、黄志坚:《韦伯的价值问题探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②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第211页。

^③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8页。

是人的主体性的塑造。但是,任何一种感性都有“异化”的可能。其一是感受性的自我异化。感受,一旦借助于语言描述,尝试二次表达,也就承受了不断被语言之“抽象”性质泛化、僵化乃至污染的可能。原本生动活泼的审美感受,便沉淀为主宰人生行动的陈词滥调^①。“我们生来都是原创,为何死时却沦为复制?”这一人生悲鸣是包法利主义者的最后醒悟。审美,其异化的极致,是沉沦为美学的“高级词汇”:因其现象和本质有着最大的混淆的可能。其二,因审美感受存在上一可能,也就为某些阶级集团提供了别有用心心的挪用或炒作的机会。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审美化,从施动者而言,是别有用心的“挪用”,是欺人;从承受者而言,更多是下意识的接纳,而导致“审美”异化成为意识形态的美好说客,是自欺。这时的审美,就其程度而言最多是“半审美”;就其性质来说,是伪审美。因为其根底是“虚假意识”。

所以,就精神本质方面而言,审美与意识形态,本是对抗而不相容的。但其间也有互通的可能。审美和意识形态都力图织就“人生的意义网络”,而使人生有了意义的悬挂。只不过从审美而言,重点不在美,而是借由美感达至存在的本真,即主体性的塑造。就意识形态而言,政治意识形态同样借助“美”,而企图塑造具有美感假象的“非主体意识”。因为意识形态从来以代天立言的姿态获得其正当性,审美情感由此也就更容易被其收编。意识形态扩展自己疆域的冲动,使其不停歇地向“情感领域”招兵买马。审美,因而成了一个特别危险的领域。真意识和假意识在其中不断对抗。危险在于,真意识只能凭借自身,它是自足的,同时也意味除此而外无所凭藉,是脆弱的“真”;而假意识本身却能不停制造动人的“理由”,使“美感”有所凭附,获得自我发展与壮大的

“基石”。因而,意识形态不仅诉诸理论说辞方面,更看重美感的领域,它充分调动文化传统中的资源,期望通过这条隐秘的渠道以景迷人、以情动人。譬如“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就运用了中国传统诗歌中的比兴手法,使此景和连带着的情与人,构成想象中的比对关系。因而,太阳变成了一个政治领袖的典型意象,太阳所具有自然属性便被人格化为人物的伟大情怀。将意识形态“审美化”而达到政治感化的目的,这一现象在我国建国后的文化语境中格外突出。

洪子诚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经典生成中,就看到意识形态如何动用其掌控的文化资源而干预、塑造人的情感形式。这一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肯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历史性地探究“美感”之形成,并不能对审美这一现象做出充分阐释。这一研究视角,取道于政治意识形态。从什么口进去,也就只能从什么口出来。它更多着眼于审美的“异化”领域,所以结论也只能是揭露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对审美感性的侵蚀,而不能对审美领域的正当性进行阐述。

三、审美是否可能

可以循上述思路提问:“我们是否应该把假意识的应用范围作无限的推广,以至于必须把一切高层次的思想——从一般的社会理论、价值观念到哲学和宗教——都化约为‘假意识’的变相”^②?洪子诚意识到这一思路运用到极致的危险,于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对此思路进行反拨性的提问:“审美是否还有必要?”“审美是否已经是文化‘精英’企图强加到‘大众’身上的病态的趣味?”^③“正像佛柯玛说的,‘谈到经典,我们要问的是,谁的经典?谁的‘好的文学’?分裂

^①钱锺书曾举南宋诗人陈渊为例说明审美感如何异化为“左右”人之感受性的“高级词汇”。陈渊在旅行诗里写道:“渊明已黄壤,诗语饶奇趣;我行田野间,举目辄相遇。谁云古人远?正是无来去!”钱锺书指出,陶潜当然是位大诗人,但是假如陈渊觉得一眼望出去都是六、七百年前陶潜所歌咏的情景,那未必证明陶潜的意境包罗得很广阔,而也许只表示自己的心眼给陶潜限制得很褊狭。王国维《人间词话》称诗词中滥用典故、代字等弊习为“隔”,亦有此意。在此,文化传统中的审美表达,具有双刃剑的特点。它既具有生成性,又随时倾向自我封闭。其走向,端赖文化承受的主体是否具有自由、自主的感受能力。

^②余英时:《再论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第178页。

^③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第127页。

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基本特征。生活于观念的整体和谐已经破裂。在一个被各种符号所构造的‘同质化’世界里,提出评价的相对性、个别性,有一种‘去中心’、反‘本质化’的意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有‘普遍性’的价值标准存在的余地?能不能提出‘普遍性’问题?”^①

在一系列辩难的声音中自可听出他的倾向,在他自己,由诗歌、小说、音乐欣赏获得的极致的人生体验,时时闪现着他极为精微的审美能力。但他却无意于将自己的审美经验置于这一“学术”语境中加以合理论证。或许,属于个人的美感经验,在这时代既无关乎“本质”,又无关于理论,又何必让它经历一次流行话语的侵蚀?然而,不说的,依然隐藏在文学史研究的字里行间,在其“阅读史”及散文中,这些“不关连‘本质’的现象”,从未“从记忆中消失”^②。回到其文学史研究中,这种情感的纠葛,化为对这一历史批判方法所要求的对文学持“价值中立”态度的警惕。因而,我们能够看到的现象是,洪子诚一面将“历史批判方法”运用于对当代文学经典生成的解释中,一方面,对此解释框架提出了质疑:“在文学史研究中,用‘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洪子诚的以上困惑之缘由,笔者以为,乃是出于头脑中两种意识的打架。一种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意识,一种则是以福柯为代表的解构意识。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出色运用“知识考古学”方法挖掘了国家意识形态如何全方位渗透进文学活动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又对这一方法背后的“解构”意识持有保留态度。在回应李扬认为的“价值中立”的知识学立场未能贯彻时,洪子诚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对于启蒙主义的‘信仰’和它在现实中的意义,我并不愿轻易放弃;即使在启蒙理性从为问题提供答案,到转化为问题本身的90年代,也是如此。”李扬、昌切等人推测说,洪子诚方法上的“沦陷”,乃是由于80年代的启蒙主义在其心中

作怪,所以妨碍了其“学术”立场的坚持。从现象表述上说,李扬等人是对的;但是,对这一现象作出的解释方向和价值判断,可能并未切中洪子诚的“理论脉络”,反而更多暴露出自身学养的不足。

福柯在中国流行已颇有时日,批评界对其理论的运用限度却少有体察。余英时即指出,由于福柯对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作了最大限度的混淆,因此一部西方思想史在他的笔下几乎成了意识形态的新陈代谢史。思想史不复具有任何连续性,而是一个“议论”的段落接着另一个段落,各段落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内在联系。这一观点系统地表现在他的《知识考古学》一书中。1972年他用“知识考古学”这种名称来代替“思想史”,似乎是把每一时代的思想观念当做已成陈迹的考古遗存来处理^③。用这样的观念来处理文学史,文学不过是阐释不同时代之意识形态便利的文本而已。文学史也顺理成章成为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新陈代谢史。

这显然不是洪子诚著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目的。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给予他的,至多是方法的启发,而其学理的内在蕴含及其学术气质,他未必认同。但这种不认同,更多表现为情感纠结,而非理性探索。至少,意识到这一解释框架的局限,力图将这一解释框架预设在对相对有效的范围内,以另一种方式来论述其合理与正当,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假如他能看到这一研究方法的盲区,而同时启用“审美”的渠道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就不仅抓住了这一时段审美感受的“异化现象”,同时也正面解说了“审美”的被压抑的感性解放功能。事实上,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并未忽视这两个方面。在1950至70年代文学历史中,洪子诚更多注目于审美的异化方面,而80年代的文学研究,则重点在于审美的主体性塑造方面。问题只在于,他似乎未能自觉平行运用这两条路线,抓住审美和意

^①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第330页。

^②洪子诚、么书仪:《两忆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③余英时:《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第175页。

识形态这两端分别进行论述,使其达到内在的融通,对文学史进行全方位的不留死角的探究。

这不免令人遗憾。既然洪子诚对自己研究史学的“价值中立”方法有如此自觉,为何对“审美意识形态”这一研究思路的盲区放弃进一步省察并力图突破之?在洪子诚,在这一逻辑的合理延展受到阻碍时,表现为以下的态度:一方面,对意识到的困惑不放过,以充分的经验来描述、表达这种困惑,让人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真实存在。另一方面,他的态度又更多停留在质疑、犹豫的阶段,而未能穿越此困惑,对此作出应有的正面的回应。或许,文学之于历史研究,更多关切于个人的精神成长,个体的生命存根。是以,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时,洪子诚在文学这一维度上遭遇的困惑,较之历史研究更难以突破。他由此感叹:“在一个没有危机感的社会里,文学的方式比知识的方式更容易暴露思想的平庸,知识尚可以掩盖那本源性的‘第一文本’的缺乏,而文学家则两手空空之后最容易暴露问题意识的贫乏和肤浅。”^①对于第一文本的执着追问,以及在此向度上遭遇的困扰,形成了

洪子诚关于“问题的个人”这一表述。对这一精神现象笔者将另文讨论。

本文以洪子诚的文学史研究作为考察对象,对“价值中立”这一方法观念的来龙去脉进行一定程度的溯源与追踪,显示了相互关联的两方面的研究旨趣。就个案研究而言,一位比较成熟的学者,其情感与思维结构是一个有秩序的整体,其中每一部分对于整体的关系、比例和价值随着整体图式的改变发生调整。因此学人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对其代表著述的细读,建构其知识与情感结构图式,进而对细部观念的意义进行审慎定位,从而显示其成就与限度。就当代文学学术思潮而言,则围绕这一个案引发的学术争议,反思当代文学史撰写的方法及价值理念。在对“价值中立”的理解中,应该强调的是文学史研究中“非纯价值判断”之性质。过于强调“非价值判断”方面而忽略人文学科研究主体与对象之“价值关联”,毋宁说是由非学术的“纯价值判断”走向了另一不可取的极端。

(责任编辑:陆 林)

Value Neutrality and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Methodology of Hong Zicheng'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XU Min

Abstract: When writing his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Hong Zicheng tried to take a value neutrality position. What is controversial about his writing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is that in his effective exploration of how national ideology permeates every part of literature he successfully employed Foucault's method of knowledge archaeology but at the same time he kept his distance from the deconstruction pursuits intrinsic to Foucault's method. Due to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reality and motivations for doing research, different scholars sometimes give conflicting interpretations and theorizations of such relationships as those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 as well as between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Hong Zicheng's narration of literary history provides us space for further examining contemporary literature's academic aspirations and boundaries.

Key words: value neutrality; Hong Zicheng;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methodology

^①孙歌语,参见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第211页。